

# 基于文化接受者的明清时期中欧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岭南私家园林简析

Lingnan Private Gard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Cultural Receivers

田靖雯 张秦英\*  
TIAN Jing-wen, ZHANG Qin-ying \*

**摘要:** 明清时期, 岭南地区经济发达, 文化水平高, 与西方交流较为密切, 其私家园林的建设也随之兴起。以中欧文化交流中的“接受者”为中心, 研究得出人们在接收外来文化时, 会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园林基础等物质条件, 以及政治、宗教、人文思想等非物质条件的影响, 从而对“传入文化”作出调整, 再建造形成独特的中欧结合的岭南私家园林。其布局及园林元素设计都呈现出与江南私家园林、北方私家园林所不同的园林特征。

**关键词:** 中欧文化交流; 岭南私家园林; 文化接受; 再创造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641 (2022) 01-0033-05

**收稿日期:** 2021-11-04

**修回日期:** 2021-12-17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Lingnan region developed economically, it had a high level of culture and had close exchanges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private gardens also rose. Based on “receivers” in China-Europe cultural exchange,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while receiving foreign culture, the private gardens were affected by some material conditions, such as local natural condition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local landscape, as well as some nonphysical conditions, including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as, then adjusted “incoming culture” to build some unique Lingna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 and Europe. Their layout and elements design showed feature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private gardens in the Yangtze Delta and Northern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Lingnan private garden; Cultural acceptance; Re-create

学者钟鸣旦等讨论了应用于清末清初中欧文化相遇研究中的4种不同框架, 其中的第二类框架即以文化传播的接受者为研究主体的接受类框架(如“中国中心观”)<sup>[1]</sup>。文化传播是一个由传播者通过一定的方式传播信息, 而后接受者接收到一定的信息, 最后将其表达出来的过程。历史学家观察到, 信息被接受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传播者所传播的与接受者所接受的是不同的<sup>[1]</sup>。这种信息的变化并不是接受者误解了信息, 而是交流难免存在“不可理解性”。

文化经传播者之手传入后, 面临着“接受者是否接受了此类信息”“接受前后信息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是如何”“地理、气候、经济等客观因素, 以及接受者的身份、爱好、宗教等主

观因素是否都会影响文化的接收”等问题。根据文化传播的过程可以推断, 当信息被置入不同的情境下时, 难免会发生变化。接受者在变化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他们是如何接收文化, 又怎样进行“再创造”的, 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

明清时期, 正是中欧文化交汇、交融的时期, 岭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成为了一个较大的文化交流窗口。园林能综合反映一定的历史情况, 是后人探究中欧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切入点。因此选取明清时期的岭南园林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中的文化交流痕迹, 明确文化交流过程中接受者的表现及其对园林发展的作用。另外, 本文中所提到的“岭南”指的是狭义上的岭南地区, 即以广州市为中心的广东省。

## 1 岭南地区与西方的交流概况

岭南, 作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最早的交汇地区之一, 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sup>[2]</sup>。《汉书·地理志》记载:“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 传国至武帝时, 尽灭以为郡云。处近海, 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 多取富焉。番禺, 其一都会也”<sup>[3]</sup>。可见汉时岭南地区便已依靠优越的海上交通条件, 与海外进行了贸易往来。此后的对外交流不断, 包括南朝时印度禅宗始祖达摩来广州传播佛教文化<sup>[4]</sup>; 隋朝时广州至波斯湾的航线最为著名, 今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唐朝时伊斯兰教传入;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 广州的对外贸易发展达到盛期。至清代, 随着对外交流的进一步

开放，海外移民形成高潮，其他国家也在广州地区陆续设立商馆，从平民大众的寻常生活中即能感受到中西文化交流（表1）。舶来品及西方艺术思想的传入则进一步影响了岭南人民的审美，进而影响造园活动。从整体布局，到山、水、建筑、植物等元素的巧思，以及材料的选择等等，都不难看到外来文化的痕迹。

## 2 从海山仙馆看中欧交流

清朝道光十年（1830年），潘仕成置地修建别墅豪宅，并命名“海山仙馆”，又称“潘园”，是行商园林的代表之一。其兼具私家园林的属性，又有城郊风景区的架势，在园林艺术、规模形态、国际影响诸方面确有特色，实属“岭南第一名园”<sup>[5]</sup>。

### 2.1 海山仙馆之接受者

园主人潘仕成（1804—1873年），字德畬，曾应道光十二年（1832年）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曾被任命为

两广盐运使、浙江盐运使等官职。道光、咸丰年间，潘氏为广州商行四大巨富家族首位，而潘仕成则是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主要经营盐务和外贸进出口生意<sup>[6]</sup>。

潘仕成一生既经商又从政，既好古也学洋，还是慷慨的慈善家，获得官员和民众的普遍赞誉<sup>[7]</sup>。他热爱交友，热爱科技与艺术，幽默又文雅，对于新鲜事物怀有包容的心态<sup>[8]</sup>。在他的主持修建下，海山仙馆的建造融入了许多外来的文化与艺术（表2）。

### 2.2 外来信息接收及处理手法

海山仙馆建造于鸦片战争之前，据清代俞洵庆的《荷廊笔记》记载：“潘氏园，园有一山，园坡峻坦，松松翁蔚，石径一道，可以拾级而登。闻此山本一高丘，当创建斯园时，相度地势，担土取名，堆而案之……一大池，广约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弥，足以泛舟。”可见，在堆山、理水、地形营造上，海山仙馆仍以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格

为主。其在继承古典园林特点的基础上，再将西方的园林、建筑特色融入其中。

### 2.2.1 园林结构

私家园林为达到私密性，一般选择构造内向型的结构，而海山仙馆则不然。园主人潘仕成常年经营对外贸易，曾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顾问，长期与外国人交往。时任广东巡抚黄恩彤曰：“大帅亦每假以宴，觐欧逻巴诸国酋长<sup>[9]</sup>”。可见，海山仙馆成为了一处中外交流的场所，内部常举办一些洽谈、游览、聚会等活动。这样的内部需求也促使海山仙馆在体量及内容上作出了一定的变化。

### 2.2.2 建筑及内部装饰

在清朝中期的“一口通商”制度下，广州成为唯一的外贸窗口，西方商品首先经过广州输入内地。受广州十三行夷馆区的西方建筑影响，行商园林开始大量使用西方建筑词汇，表现出西方建筑语符的特点，为岭南园林语系补充新的养分<sup>[9]</sup>。而潘仕成拥有与外国交流的特殊优势，能够引进一些较为“先进”的商品，并将其应用于建筑装饰中。据《荷廊笔记》记载：“面池一堂，极宽敞，左右廊庑回绕，栏楯周匝，雕镂藻饰，无不工致。”结合英国画家 Thomas Allom 绘制的海山仙馆（图1），可以看出“堂”临池而建，如此可降低温度，改善局部小气候；且池边栏杆、廊柱的工艺雕琢都十分复杂又精致，有明显的西洋风格。而建筑内部也有欧洲文化的影子，据伊凡记载：“所有房间的装饰都体现了欧洲奢华与中国典雅艺术的融合：有华丽的镜子，英式和法式的钟表<sup>[8]</sup>……”

在应用中，虽然潘仕成能积极采纳外来的优秀物资，但其对文化、物质信息的理解也存在不足；加之中欧物资的风格不同，难以融合等原因，海山仙馆的园林、建筑难以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据伊凡记载，“潘仕成那刚刚建成的豪华大厅……天花板就像个神龛那样镀了金。地板、飞檐和墙壁因涂了奇妙的清漆而亮光闪

表1 岭南地区与西方的交流概况

时期	交流事件	接受者
秦、汉	发展造船业，舶来品传入，包括银盒、金花泡、乳香、非洲象牙、饰花石髓珠等；丝织品输出；南越王宫八棱柱类似印度、古希腊石柱	南越文王、贵族等
南朝	印度禅宗始祖达摩来广州传播佛教文化	大众，中国第一个著名佛教学者牟子（岭南人）
隋、唐	持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设市舶使，包揽南海贸易，增强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来源	地方豪族、地方官乃至平民，皆可直接经营海外贸易
宋	市舶司制度完备，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	地方豪族、地方官乃至平民，皆可直接经营海外贸易
明	葡萄牙人进入、租居澳门；郑和下西洋，对外贸易达到盛期；设海禁政策，之后逐渐开放	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不允许出海
清	进一步开辟北美洲、俄罗斯、大洋洲航线；商品量上涨，茶叶、棉花为主；海外移民形成高潮；其他国家在中国设立商馆	大众皆可成为中西交流的主体

注：内容整理自参考文献 [3~4]

表2 潘仕成的个人经历与特征

身份	类型	经历	对园林建设的影响
副榜贡生	文人	热爱科技与艺术	重视科技与艺术应用
两广盐运使、浙江盐运使等官职	官员	从政，获民众赞誉	热爱开放型格局
盐务和外贸进出口生意	商人	对外交流广泛，包容心态	需要洽谈、游览、聚会等活动空间

闪，这些清漆使得所涂之物看起来就像一块块被切割、打磨的大理石、斑岩或者其他的稀有石头。但所有的奢侈品都显得冰冷和不舒服<sup>[8]</sup>……”

除以上记录以外，1848年，江苏画家夏銓也为海山仙馆绘制过图卷(图2)，其中清秀的山水园林风格显著。在1869年左右苏格兰摄影家 John Thomson 所拍摄的照片中(图3)，可隐约看出当时海山仙馆建筑中的欧式风格并非如图1般明显。由此可见，对于接受海山仙馆这具体存在的物质信息来说，接受者的身份、教育背景、个人偏好等不同，都会影响其对于客观信息的接受以及表达。以此逻辑可进行合理推理，潘仕成在接收抽象的外来文化时，无法理解透彻后适宜地表达，只能做到简单的“置入”，因而海山仙馆的艺术价值有限。

### 3 从余荫山房看中欧交流

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郭彬开始置地营建自己的私家花园，历时5年建成余荫山房，又称“余荫园”。以“嘉树浓荫、藏而不露、缩龙成寸、小巧玲珑”的姿态，被后人誉为“岭南古典园林的瑰丽明珠”<sup>[10]</sup>。

#### 3.1 余荫山房之接受者

余荫山房园主人郭彬，字燕天，番禺南村人，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考中举人，官至刑部主事，为七品员外郎<sup>[11]</sup>，而后升五品，至咸丰五年(1855年)，官从二品。咸丰八年(1858年)辞官归隐，同治十年(1871年)建成余荫山房<sup>[12]</sup>。郭彬将余荫山房的选址定在郭氏宗祠均安堂的旁边，取祖父“郭余荫”之名建造余荫山房，以期祖先庇佑子孙能有所成就。郭彬的两个儿子也是举人，有“一门三举人，父子同登科”之说。可以看出，郭彬在建造余荫山房时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文人，又是家族的中流砥柱；该园既是家族祠堂园林，又是寄托归隐思想的私家园林。2016年，番禺南村发现了一块刻有郭彬手迹的石匾，联文为“南土是保，休有烈光”，可见其对家族、同村都有着很深的情感，余荫山房也寄托了其对于家族荣耀、家乡发展的美好祝愿(表3)。

#### 3.2 信息接收及处理手法

广州作为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长期以来与洋人接触较多，对于彼之习性和各种一般状况略有所闻<sup>[13]</sup>。清朝道光二年(1822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蜜蜂华报》，这是在我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sup>[14]</sup>，可见中欧交流已经慢慢从贸易渗入到了生活。园主人郭彬作为思想先进的一批人，率先受到了欧洲园林文化的影响，“棱柱”“玻璃”“方形水池”等逐渐应用于私家园林中。

##### 3.2.1 园林结构

郭彬在花园建成之时，为其题了一幅园联“余地三弓红雨足；荫天一角绿云深”，从中可以看出此园具有仅“三弓”之小，却也能“红”“绿”兼备，既“足”



图1 19世纪英国画家 Thomas Allom 绘制的海山仙馆



图2 夏銓所绘制的海山仙馆局部图



图3 19世纪苏格兰摄影家 John Thomson 拍摄的海山仙馆长廊

表3 郭彬的个人经历与特征

身份	类型	经历	对园林建设的影响
举人	文人	热爱文学，重视学习与自洽	古典园林建筑运用较多，对外来事物接受度较高
刑部主事，后官从二品	官员	官从二品，后辞官归隐	寄托归隐思想，创造舒适、美观的园林
举人之父	家族中流砥柱	父子皆为举人，对家乡情感很深	建造祠堂园林，保佑家族、同村

且“深”的特点。余荫山房是较为典型的私家园林，其面积较小，内容简明，园中保留了古典园林中的一些典型手法，如以游廊划水面，在加大景深的同时对水面有所收束，以及亭、厅、堂、榭、馆、廊等古典建筑的保留运用等等。而外来园林文化对其影响也十分明确，如余荫山房的布局形态便是少见的规则式（图4）。

### 3.2.2 理水手法

欧洲园林的规则式与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式相对，也影响到了余荫山房的建设。在理水手法上，首先，园内水体的形式呈规则式布局，与周围的建筑、假山相互渗透；其次，在引入规则水体时，园主人根据本土园林的规模，对其大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而达到宜人的尺度感；第三，在中国传统园林中，水体大多作为园中主景，建筑为辅，来营造景观，当受西方园林中建筑作为主景引领园林的影响后，通常根据当地园林的自然环境和造园手法来设置水景与建筑的关系。

东部八角形的玲珑小榭作为花园中的主要观景点和主要景点，立于水池中间，四周水渠平行环绕，造型奇特，引人注目。西部方形水池采用直立式的池壁，既节约空间，又显得宽

敞，池壁用条石或块石整砌，保持其边缘规整光滑。水池还设置围栏，形态多样，有些呈西洋样式。

在外来水体样式传入的过程中，园主人根据一定的环境背景进行了筛选和调整。岭南地区炎热多雨，整齐的砌石池岸有利于庭园水体流通，少生蚊虫，即实用又新颖。水体样式虽是从西方引进，却受到了接受者的本土化调整，改造后得到了适合于当地气候条件和人们喜好的新形式。

### 3.2.3 套色玻璃窗

玻璃，或作琉璃、流离、壁琉璃等，为梵文名 VAIDURYA 或巴利文名之 VELURYA 之对音，义为青色宝。明清时期，欧洲英国、法国的玻璃制造业已有很高水平，其生产的玻璃产品质量很高。然而本国玻璃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大都为作坊，没有实行机械化，其质量也难与西方玻璃相媲美。所以明清之际的玻璃大都是舶来品，从一口通商的广州进口，再根据实际需要，在广州加工，运到岭南各地。岭南园林中常见的套色玻璃的使用，是其独特的园景套色手法，在同时期的北方皇家园林和江南的文人园林中是见不到的<sup>[2]</sup>。

彩色玻璃窗，又称满洲窗，主要

是用木格扇镶嵌彩色玻璃花窗制造而成（图5）。中国传统的木门窗扇是在棂心处粘贴草纸以分隔内外，但草纸只透光不透明且容易损坏。而玻璃材料的到来与中式的花格棂心、木格扇门窗形成了绝佳的配合<sup>[15]</sup>。彩色玻璃色彩丰富，观赏性强，余荫山房满洲窗主要分布在供宾客休憩的卧瓢庐、瑜园一楼走廊和客厅、深柳堂等厅堂中。

象征着文人品格的“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是文人最为偏爱的纹样，邬彬也不例外。在余荫山房中，彩色玻璃经精湛的加工技艺，加以与门窗棂心原有图案对应的适应性改变，延续了原有中国木格扇棂心的传统艺术韵味。中欧文化的结合，让窗棂变得更加绚丽和神秘（图6）。

套色玻璃从西方引进，接受者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拿来”，而是受中国传统技艺和文化的影响，基于本土文化，对外来品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使得最后的作品既能应用饱含异域色彩的新材料，又能保留传统文化与艺术。

### 3.2.4 建筑细部

余荫山房的建筑以起居为主要功能，建筑的门窗、挂落、栏杆等构件依旧是以砖、木、石等为主要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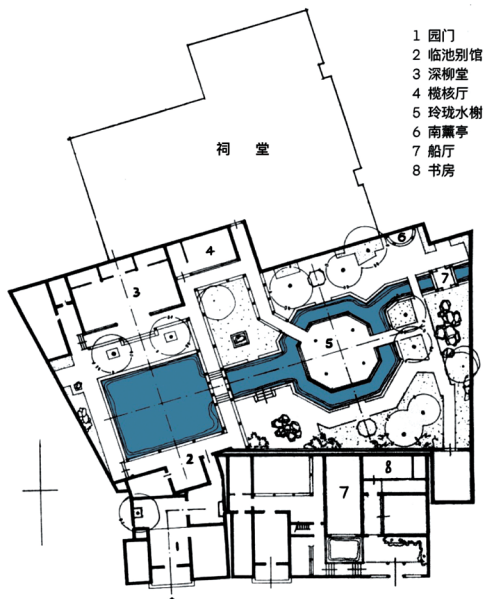


图4 余荫山房平面



图5 余荫山房中玻璃花窗



图6 余荫山房玻璃花窗中兰花图案

其构造的建筑形式也较为传统。但受西方巴洛克式建筑、哥特式建筑等影响，余荫山房中还出现了许多明显带有欧洲风格的细部设计，例如在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以及巴洛克式柱头；小姐楼（瑜园）中使用了进口的百叶窗扇，其阳台上还运用了西式花瓶状栏杆。

善于吸收外来建筑材料、技术和工艺，融中西装修手法于一体，是岭南私家园林的一大特色。接受者虽从西方引进建筑的风格、材料，却根据实际情况以及个人的审美、爱好等，对其加以一定的改造，融合其他的传统设计，使成品既能与原有功能不冲突，又具有新形式和新材料。

#### 4 小结

通过了解“接受类框架”的内涵，并基于“以接受者为中心”去看待文化交融的现象，不难发现，接受者接收信息后，常常会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这与常说的“外来文化本土化”有类似之处。

从接受者出发，首先了解到的是广东地区自然气候条件炎热潮湿，对外贸易发达，对外交流密切，因此外来文化渗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当中。久而久之，他们思想开放，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从海山仙馆和余荫山房的园主人来看，他们富有才气，文化程度较高，对于外来文化也更有辨别和应用能力。

通过对海山仙馆和余荫山房的分析，可以发现外来文化会渗入到园林的各个方面，如园林各要素的整体布局，理水手法的应用，建筑以及建筑构件的材料和样式选择等。不难发现，在接收外来文化和信息时，接受者常常会基于现有的自然及人文条件，来选择是否接受信息以及如何接受信息。这与“拿来主义”是不同的。同时，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几乎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客观和理想。所以基于接受者视角，可以发现，信息在接收和再表达的过程中，仍会发生改变。

而接受者常常会基于现有的自然、经济以及园林基

础等物质条件，以及政治、宗教、人文思想等非物质条件，对外来文化加以改造，能得到适合于当地气候条件与人们喜好的新形式；能得到既保留了传统艺术，又加入了异域色彩的新材料；能得到既保留原有功能，又运用新的形式和材料的新型建筑构件、小品等。可以发现，基于接受者的各类环境背景来接收信息，能有效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信息的再创造。这对于新型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图1来自 [http://www.gzwxw.gov.cn/dmtwsg/tsws/201409/t20140922\\_34838.htm](http://www.gzwxw.gov.cn/dmtwsg/tsws/201409/t20140922_34838.htm)；图2来自 <https://www.douban.com/photos/photo/2600156732/#image>；图3来自 <https://www.163.com/dy/article/ET7U373G0544518N.html>；图4来自周维权的《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676）；图5来自 [https://www.sohu.com/a/314381908\\_100020262](https://www.sohu.com/a/314381908_100020262)；图6来自 [https://www.sohu.com/a/314381908\\_100020262](https://www.sohu.com/a/314381908_100020262)

#### 参考文献：

- [1] 钟鸣旦, 刘贤. 文化相遇的方法论: 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J]. 清史研究, 2006(4): 65-86.
- [2] 孟宪军. 从岭南园林看中外文化交流[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1.
- [3] 班固. 汉书·地理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4] 覃召文. 岭南禅文化[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5] 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 广州美术馆. 海山仙馆名园拾萃[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 [6] 陆琦. 广州海山仙馆[J]. 广东园林, 2008, 30(5): 74-75+2.
- [7] 刘佩. 广州十三行商潘仕成研究[D]. 广州: 广州大学, 2013.
- [8] 伊凡. 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M]. 张小贵, 杨向艳,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 [9] 杨宏烈, 高刘涛. 粤商园林海山仙馆的文化特色研究[J]. 中国名城, 2013(8): 43-48.
- [10] 罗汉强, 梁莲英. 余荫山房[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 [11] 陆琦. 余荫山房[J]. 广东园林, 2006, 28(4): 63.
- [12] 罗汉强. 余荫山房的园林文化[J]. 广东园林, 2010, 32(2): 77-78.
- [13] 郭维勇. 广州同文馆的历史作用[J]. 岭南文史, 1985(2): 115-120.
- [14] 袁钟仁. 古代广州地区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4(2): 57-67+88.
- [15] 张原浩. 从石室教堂到余荫山房——看彩色玻璃窗中西营造[J]. 建材与装饰, 2018(10): 71-72.

#### 作者简介：

田靖雯/1998年生/女/湖南常德人/天津大学(天津300110)/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历史文化研究

(\*通信作者) 张秦英/1977年生/女/河北永年人/博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110)/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景观设计与绿地功能优化/E-mail: qinying\_zhang@163.com